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是人类史上不曾有的,我们非常需要总结新的理论,来自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会有更大的参考价值。

# 农业援非的中国方案

■本报记者 秦志伟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李小云带领研究团队一直在非洲实地从事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工作。在此期间,平行经验分享、科技理性漫游、模糊边界、援外专家身份认同、本土互动等概念不断被提出,借以探究日益加深的中非农业合作政策和实践。他们意识到,是时候对其进行系统性总结了。记者获悉,该团队研究成果之一就体现在日前出版的《新发展的示范》里。

事实上,“中国对外援助”一直是热度不减的话题。李小云团队研究证明,中国对外援助以技术、示范为核心,未带任何前提,给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一个新发展方式的可能选择。

如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人民决心与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庄重承诺,而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看成是兑现这一承诺的战略愿景。

日前,由农业部、教育部、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主办的推动“一带一路”农业合作论坛在北京举办。论坛上,中国农业大学宣布成立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并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

“学校将通过政策对话、农业科技创新与传播、人才培养、新型国际发展知识生产等四大支柱为实现全球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升世界粮食安全水平,推动国际减贫等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说。而来自援非农业的中国方案正是一个缩影。

## 无优越感:塑造实践中的新角色

非洲农业长期的发展不足促使国际社会将其列为国际援助的重点领域之一。而在非洲这片热土上,不同国家的发展援助方式不尽相同。

埃塞俄比亚外交和国际合作部负责管理发展援助的常务秘书对李小云道出了中国和西方的做法不一样。西方更热衷于帮助他们设计发展计划和政策,找他们商量如何和各个部门开会协调;而中国朋友更像企业家,忙着找市场,找合作,找他们解决项目中的具体问题。事实表明,非洲国家也感觉到中西发展援助方式的差异。

实际上,中西方发展援助方式的差异体现在多个方面。以中西方国家援助专家为例,西方国家的援助专家会接受专门的全球化使命教育,带有西方文化“进步”思想,到非洲有类似于“传教士”的意义,而中国援助专家没有这种心态。

作为长期从事非洲研究的农业专家,李小云有切身体会。“没有西方专家那种优越感,看到的更多是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似性。”李小云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显然,这种心态塑造了中国援非农业技术专家在实践中的行动、角色和身份。

“不同视角反映出的中西对外发展援助的差异究竟代表什么,我们还不能断言。”李小云



▲李小云(右三)在坦桑尼亚雅雅村调研并指导农作技术。



▶中国农业大学学生在村庄调研。

说,但他引用了国外学者 De Hart 所说的话:“全球发展已不再由西方国家所控制”。

随着中国对外援助规模的扩大和援助方式的日益多元化,李小云认为有必要在深层次上回应这一问题。

追溯中国的对外援助历程,经历了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现在的一系列变化,特别是新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启动,标志着中国在发展援助领域由双边行为向多边制度化行为转变,也是中国介入全球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

在李小云看来,这个转变不仅是话语权层面的变化,还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从经济层面将中国和世界在“新发展”框架下连为一体。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是人类史上不曾有的,我们非常需要总结新的理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会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在论坛上表示,将中国转型的成功经验总结推广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新挑战和机遇。

## 异域创新:科技理性的一场漫游

农业技术一直是中国援助非洲的重点。记者了解到,《新发展的示范》一书正是以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为研究对象,“具体而微观地从历史、技术、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分析‘中国在非洲’这一宏观命题。”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武晋指出。

迄今为止,我国已在 23 个非洲国家兴建了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中心运营分为三个阶段,一到两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期,三年的技术合作期,可持续展期。

据悉,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是在 2006 年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被正式提出的,是中国对非援助的八项措施之一。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徐秀丽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农业尤其是近 30 年的发展历程,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科技理性不断“张”的过程。“长期以来,中国在突破人地高度紧张关系情况下形成了依赖技术的路径,而非制度的创新。”徐秀丽解释道。

在李小云看来,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出现本身就是科技理性从中国向非洲漫游的升级版,是在原有实践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务实考量的综合产物。

李小云、武晋带领团队深入非洲,实地考察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日常运营状况,试图分析中国漫游性的农业科技理性在当地日常运行中遇到的挫折和反弹,尤其是中非之间关于农业与技术、示范与推广、援助与发展的不同认知。

以示范与推广的不同认知为例,中国科技理性的一个核心特征是政府主导,具体在农业技术示范和推广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互相协调,直接推动了政府、科技人员和农户之间协调机制的建立和稳固。

他们在调研中发现,长期受此熏陶的中国农业专家在非洲开展示范和推广中,也希望像在中国一样获得非洲政府和当地科技体系的支持。然而,往往事与愿违。“与中国不同,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政府缺乏强大的财力和人力动员能力。”徐秀丽说。

显然,这种认知上的分歧和冲突无法避免,相互调试、相互学习将要时刻发生着。徐秀丽认为,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对于宏观上的中非关系意义非凡,表明了一种新型中非关系孕育的基础和过程。

毋庸置疑,各国对外援助都反映了各自的文化和发展理念。“理论和经验的适用性取决

于条件的相似性。”林毅夫表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较为相似的挑战,中国的发展经验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启迪。

## 南南合作:提供发挥能动性空间

长期以来,中国强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南南合作关系,鼓励通过援助与投资、贸易相结合来实现援助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进而提高伙伴国发展有效性。

农业技术转移和经济合作一直是南南合作的中心议题。“事实上,在过去五十年的中非农业合作历史中,农业技术的转移一直贯穿始终,并日益凸显为实现中国对外援助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齐硕说。

具体到援助项目的实践过程,中国为激励运营单位,将援助款项交给运营机构,由运营机构来确定项目款项的用途,选择项目具体实施人员等。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唐丽霞看来,这就为项目的实施机构和人员提供了发挥能动性的空间。

确切地说,“如何平衡国家使命、公司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对于各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运营者来说,都有很多可以发挥能动性的空间。”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张传红指出。

“中国农业专家作为普通的个体、社会行动者,既有个人的经济动机,又承载着国家的政治使命,承载着中国梦,他们是中非国家之间的绿色使者。”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张传红说。

其实,回顾中非等南南国家间农业合作,可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间的农业合作提供借鉴,这也是各国专家学者在论坛上讨论的主要话题。

在论坛上,“我们正式发起成立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和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就是更好地响应中国政府推动世界各国外合作和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一条开放性举措。”孙其信说。

据悉,中国农业大学成立的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是一个校级综合平台,旨在利用中国农业大学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各种资源,在农业领域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而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是旨在依托“一带一路”农业合作的机制,共同推动新型南南合作,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贡献的新型机构。

在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对外合作办副主任张陆彪看来,两个学院的成立恰逢其时。他希望中国农业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充分发挥优势,开展复合型国际农业人才培养,引领全国农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服务于国家对外农业合作战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共享中国农村农业发展的经验,与农业企业走出去更紧密衔接,打造海外农业援外基地,促进各国实现粮食安全。

“加强‘一带一路’农业对外合作,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更需要责任担当。”张陆彪说。

## 新农讲

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仍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仍然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全面小康征程上受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影响最大的群体仍然是农民。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问题更加凸显,广大农民对缩小城乡差距、共享发展成果的要求也更加迫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把握我国现实国情农情,深刻认识我国城乡关系变化特征和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和补齐农业农村短板的问题导向,对“三农”工作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的新的目标要求,必将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乃至现代化进程中写下划时代的一笔。

## 历史使命 必然要求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乡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发源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乡村的富庶是盛世历史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之后较长时期内,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都是城市和工业,而乡村和农业则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对乡村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使命。

乡村振兴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我国城镇化水平不高,农村人口总量庞大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不会有国家的现代化。当前,与发达国家相比,乡村仍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短板。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速度较快,而乡村发展则一直较为滞后,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农民市民化后,与城市相比,乡村的经济落后、环境恶化、基础设施薄弱、增收缓慢等问题更加凸显。

因此,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三农”发展的出路,涉及乡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建设。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具备了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各方面条件,要动员全社会各方力量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尽快形成“三农”发展新格局。

## 新动能 新任务

乡村振兴战略确立了新时期乡村发展新动能。进入新世纪,我国进一步加大了“三农”政策支持力度,2004 年起连续 1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问题,2007 年和十八大也先后提出了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有力推动了乡村发展和农民增收。但从这些政策的发展动能来看,主要强调城市对乡村的反哺、工业对农业的支持,乡村和农业均处于被动地位。

而乡村振兴战略把乡村置于和城市平等的地位上,更加充分地立足于其产业、生态、文化等资源,更加注重发挥其内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构建长效的可持续发展动能机制。这是发展思路的根本性转变,确立了全新的城乡关系,乡村要从过去的被动接收反哺,到今后的主动作为、实现振兴,进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新时期乡村发展新任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农业农村发展到新阶段设定的新目标,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我国近六亿农村人口擘画了宏伟而美好的蓝图。相较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除了沿用“乡风文明”外,其余四句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前强调“生产发展”,现在要求“产业兴旺”,层次更高,要跳出单一的农业,实现三产融合发展,让农业成为盈利产业并带动农民增收;以前要求“生活富裕”,如今面向全面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更要“生活富裕”;以前要求“村容整洁”,现在要求“生态宜居”;以前要求“管理民主”,现在提“治理有效”,向多方参与“治理”转变。

## 吸纳经验 科学规划

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容易导致乡村的发展陷于停滞。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重视乡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引导下,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保障制度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乡村发展道路,有效解决了工农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过大等问题。

如日本的“造村运动”,主要通过政府扶持和“农协”引导,发展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韩国的“新村运动”,以美化环境和农村改造建设、教育培训与激励机制结合为着力点;德国的“村庄更新”,侧重乡村规划与布局,强调可持续的现代特色农业;我国台湾省的“富丽乡村”,着重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等特色产业,深入挖掘乡村内涵,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

目前,在欧美发达国家,一些环境优美的乡村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标志和象征,生活品质也远高于城市,成为民众休闲休憩的重要区域,一些乡村庄园甚至成为接待外国元首的外交场所。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乡村发展和建设道路也存在较大差异。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基础差、农村底子薄、农民竞争力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照搬发达国家和地区完全依赖政府强大财政供给的路子,也应尽量避免部分拉美国家城市贫困和农村衰败并存的“陷阱”局面,必须把乡村振兴作为新时期“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牢牢把握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制定符合现实国情农情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稳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亿万农民早日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 乡村振兴战略写下划时代的一笔

■李先德

## 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陈萌山:

# 食物营养转型推动健康中国建设

■本报记者 李晨

“我国农业发展即将进入,或者说正在进入营养与健康的新阶段,食物营养发展正在经历三个方面的深刻转型。”12月8日,由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主办的“2017 健康中国——食物与营养高层研讨会”在京召开,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陈萌山在主题报告中指出,三个方面的转型包括:从生存型食物供给保障向健康型满足营养需求转型;从一般性、大众型农产品消费为主向个性化、定制型食品消费转型;从吃饱、吃得安全向吃出健康、吃出愉悦转型。

## 四大物质基础提供转型空间

“中国食物营养发展转型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四大物质基础为转型提供了空间。”陈萌山指出,首先,我国农产品供给能力实现了新突破,为农业生产向营养健康转型提供了更多变革空间。“农产品生产能力的增强,为农业从主要提供初级农产品向多功能、三产融合发展转变,这就为我们加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营养健康导向型农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其次,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工业开创了新的局面,为食品制造业向营养健康导向型转型奠定了坚实的产业装备与工业基础。2015 年全国食品工业总产值达到了 11.34 万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 16.76%,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我国许多省份的第一大产业。农产品加工转换率达到 65%,初步形成了东北地区、长江流域水稻加工,黄淮海地区优质专用小麦加工,东北地区玉米和大豆加工,长江流域优质油菜加工,中原地区农业热加工,西北和环渤

海湾地区苹果加工,沿海与长江流域水产品加工等产业的聚集区。

其三,食用消费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初步形成了居民膳食结构向营养健康导向型转型的消费模式。城乡居民膳食结构更加多样化,特别是人均摄入能量、蛋、脂类显著提高,居民营养水平已经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消费的这种转变,为营养健康型的消费模式提供了很好的社会环境。

其四,营养与保健食品业形成了新的选择,为市场供应向营养健康导向型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十二五”期间,我国营养与保健食品制造业对 GDP 的贡献率接近 1%,年增长超过 20%,食品相关企业达 5000 多家,发展势头良好,市场影响力日渐增强。

陈萌山认为,当前食物营养转型发展面临四大机遇,包括前所未有的宏观经济环境、社会关注程度、政策标准引领、网络实现途径等。

## 三个“不平衡”和两个“不协调”

“不过,食物营养转型发展之路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矛盾。”陈萌山说,主要矛盾可以总结为三个“不平衡”和两个“不协调”。

第一个不平衡是食物资源供给与消费需求之间不平衡。这主要表现在粮食内部结构存在不平衡,以及食物生产结构与居民消费需求之间不平衡日益凸显。产略大于需,但优质粮食供给不足,进口压力持续增加。

第二个不平衡是食物消费和营养摄入结构不平衡。从食物消费提供的营养素与居民营养需求来看,我国居民人均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三大营养素供给充足,能量供给总体

过剩,但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微量营养素的摄入量与推荐量之间的差距还很大。有 90%以上人群钙的摄入量没有达到推荐摄入量,50%以上的人群锌的摄入量没有达到推荐摄入量,70%以上的人群没有达到维生素 C 推荐的摄入量。

第三个不平衡是城镇与乡村之间营养状况发展不平衡。我国贫困地区特别是部分边远贫困地区,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素难以满足健康需要,营养不良的现象还存在。而城乡居民因膳食不平衡或营养过剩引发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等慢性疾病预防,各种慢性病患者已超过四亿人。

两个“不协调”表现为:不断增长的食物需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不协调,过去长期追求产量规模的粗放型生产方式,食物生产面临着资源的约束和环境的挑战;生产加工技术与营养健康导向不协调,表现为现有的追求产量的生产、加工和物流技术体系,不能满足主要追求安全、营养健康的需求。

## 两个“坚持”与四个“推进”

“顺利推进食物营养转型发展,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政策法规标准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通过推动创建国家食物营养教育示范基地,加强营养知识普及与消费引导,加快食物生产消费营养一体化。”陈萌山指出,要实现食物营养转型发展,主要路径包括两个“坚持”与四个“推进”。

坚持大食物、大营养、大健康理念。以大食物理念,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以营养需求为指导,把能力安全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



陈萌山

把营养提升作为保障能力安全的重点。

坚持营养指导消费,消费引导生产。顺应新时代的营养健康要求。食品安全的理念要更加突出生产、消费、营养、健康的协调发展。食物生产的目标,要从过去单纯追求产量逐步向营养为导向的高产优质、高效生产转变;食物发展的方式,要由过去生产什么吃什么逐步向需要什么生产什么转变。

要着力推进营养导向型技术和营养标准的建设。要从食物全产业链审视营养转型的技术需求,在科技队伍建设、科研立项、成果转化、产业示范等工作中贯彻营养健康导向意识,迅速形成适应营养转型需求的科技力量。营养健康转型要标准先行,研究编制农产品营养标准体系的科学研究与建设规划方案,迅速启动基于营养标准制定的农产品分类研究。

要着力推进居民营养干预的有效落地。扎实推进食物营养定期监测政策,对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实行营养干预。重点区域要关注贫困地区、流动人口和新兴城镇化地区;重点人群要关注老年人、儿童青少年、孕产妇等。

要着力推进食物营养政策法规的健全实施。贯彻落实《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国民营养计划》《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进一步出台系列重大助推举措,有序推进国家食物营养教育示范基地的创建和运行管理。据悉,本次研讨会上,广东省梅州市人民政府等 13 家单位成为首批食物营养教育示范基地创建单位。